

醉倒三台

朱玉麒

新疆叫三台的地方有好几处,是清代新疆军府制度时期军台建置留下的地名化石。从伊犁将军府所在的惠远城出发到鄂博勒齐尔,是第三个军台;从莎车出发到迈那特,也是第三个军台。这些地方都叫三台,连鄂博勒齐尔跟前大名鼎鼎的旅游胜地赛里木湖,也被称作了三台海子。出乌鲁木齐往东二百多里地,过去叫惠来堡,又唤作“三台塘”、“三台驿”。据说未必是因为从迪化出发的第三个台,而是本身就有上台、中台、下台三台。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充军伊犁,经过此地,如是说。

我在新疆接触最多的三台,就是吉木萨尔的三台镇。之前不说了,进入21世纪有20年了,我经过那个地方不下20次,虽然从来没有去游览过。我的目的地常常是三台东边的县城,带着内地的学者从乌鲁木齐去看北庭都护府遗址。往返一天的行程非常紧张,在经过三台的时候,我会在车里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三台,出产有名的“三台老窖”。过去的牌子是“北庭大曲”,吉木萨尔县最有名的酒厂就在三台,虽然北庭在县城那边,“北庭大曲”却是在三台,这个专利还没有谁能争。全真教徒丘处机到过当时叫“别失八里”的北庭,他后来被金庸写到了《射雕英雄传》中,以“牛鼻子老道”名闻天下,酒厂最近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全蒸窖”的品牌。不过我从来不建议大家在这里停留,因为三台人好客,他们有一句名言是“三台人民欢迎



袁复礼在三台红土坡发现全架化石



袁复礼摄下“三台快乐的一对”

你,三台老窖喝死你!”

这么直截了当的祝酒词,硬核程度远远超越了古往今来从“醉卧沙场”到“不醉不归”的好汉歌!这个时候,我的解说会成为大家见到北庭之前的一个小高潮,连从来不苟言笑的莫砺锋教授,也被我忽悠得激发了文学的多巴胺,说了一句让我吓个半死的豪言:“那我今天一定要喝个半死!”

← (上接3版)

(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9页)桐城宗师姚鼐尝谓:“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惜抱轩尺牍》卷六)林纾所谓“默诵”,可能还不是与朗诵对立的“默看”(silent reading);但他所提倡的古文读法,应已有别于曾、张、吴的传统。除了翻译西洋小说的潜移默化,对于辛丑以降长年在京城学堂任教的林纾而言,这种读法的变化或许也跟新式学校的课程体制和教室空间有关。章士钊曾在1907年撰《初等国文典·序例》中指出学堂不同于私塾,其“学课各科之配置,皆有定限,其国文一科,必不复能如吾辈当年之吟诵者”;学堂教习的著述是

讲义、教科书,学生反馈则为札记、课作。如曾国藩那样“声音达十室以外”的高诵朗吟,在新式学校中虽然不无回响(如所谓“黄调”、“唐调”的吟诵),但要在普通学堂五六十人的教室空间和一减再减的国文课时内得到贯彻,毕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实际困难。

以上旁及林纾对桐城、湘乡一系古文声气论的态度,并不涉及他是否属于所谓“桐城派”的争议。关于后者,学界早有名论,毋庸赘述。话题还是要回到“三古文家”合影上来。在合照的当初,林纾作为“汉文高师”进入吴汝纶的视野,应该跟他在新式学堂中从事古文教学的背景有关。换言之,林纾和严复一样,都被吴汝纶认作是“新而能旧”的人物,是能延续曾国藩以来古文实用化思路,把古文(至少是古文的笔法)运用于



三台古塔

如果不是关注袁复礼,三台在我的印象里,也就是这样了。

等我最近几年开始关注西北科学考察团,特别是袁复礼的考察成果时,才发现,正是在三台境内的大龙口周边,袁复礼第一次发现了东部天山地区的恐龙化石。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他延长了在三台的考察期,人手不够,连本来只是驼夫的库尔班也上阵投入到了采掘之中。虽然一些基本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骨架和硕大的恐龙蛋刚刚编号装箱,听到这个消息的斯文赫定欣喜若狂。那个节骨眼,正是新疆政府拒绝了开放空中航线而汉莎航空撤回了对考察团的资助,斯文赫定需要另觅经费完成

西学翻译、学堂教育等新场合的合适人选。那么,反过来,实际上并不以桐城或湘乡文派自限的林纾那里,吴汝纶的份量又有多重?

一方面,林纾时而标榜与吴汝纶的遇合,不仅借此抬高自家古文名师的身价,更可呼应师出吴门的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人。但在林纾内心,却未必完全认可吴氏所传古文之学,甚至对张、吴共同提倡的因声求气论有所排斥。事实上,这也正是清末民初“二姚一马”所代表古文之学的新趋,钱基博所谓“不如并世诸公之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断硬接;而我用我法,余味曲包”(《现代中国文学史·散文》),说的正是这辈桐城嫡传对于曾国藩以来扩充古文堂庑路线的背离。须知,在吴汝纶身后,其师门已然分裂:居河北的贺涛、吴闿生等

他的“探险”之旅的当口。探险家的使命就是要发现“楼兰”这样的地方,或者“游移的湖”这样的自然现象,只有发现,才能获得资助。这次,当严谨的科学家袁复礼只是在通信中向中方团长徐旭生提交“请假条”,说明在三台延期工作的原因时,西方的报道经由赫定的渲染而名声大噪。袁复礼后来追忆说:赫、徐二位团长通电国内外,要求作为科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进行报道。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以头条位置登出,一时国内外报

纸争相登载。法国的一家报纸更渲染为:“七个活的恐龙在中国新疆发现。”瑞典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沙漠中发现大如驴的恐龙蛋”,则更是极尽了夸大与想象之能事,消息一时轰动了全世界的学术界。

三台的发现后来经过地质学家杨钟健、戈定邦等参与修复研究,得出了“所有的各种爬行类化石皆产于晚二迭世到早三迭世地层中,属连续沉积,没有间断,总厚为260米”的结论。按照学术界的命名法则,两个新的恐龙品种冠以袁复礼的姓氏,而称为“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后来的一个水龙兽新种命名,也分给了团长赫定老儿一个,唤作“赫氏水龙兽”。

三台的发现是决定性的,此后袁复礼对准噶尔盆地东部的地质、古生物调查才得以有目的地全面展开,甚至也直接改变了

袁复礼的返程线路:当所有的考察团员沿着苏联的铁路各奔东西的时候——黄文弼、丁道衡等往东返回到满洲里入境南下去北平,李宪之、刘衍淮往西穿越立陶宛、拉脱维亚去了柏林攻读气象学——袁复礼一个人组织了驼队,经过甘肃、宁夏、内蒙古,一步步推轮记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到了呼和浩特。他的返程重新考察塞上地貌,在这里发现了“宁夏结节绘龙”等其他大型爬行类动物,为此次西北科考团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考察作了完美收官。

三台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地方。我不知道袁复礼先生是否解得酒中真趣,是否喝过三台大曲。至少,因为恐龙的发现,他已经醉倒三台!

袁复礼确实对三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说:三台是一条商业街,熙熙攘攘,殷实商店林立,百货齐全,足以供应附近四周农牧民们的需要。他还说:自三台向南延伸5公里多的广阔平原,是五谷丰登的富裕农业区。……他还用相机记录了地质考察之外的三台民俗风情,其中有一张“三台快乐的一对”,是三台的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婴儿的合影。《黄文弼中心通讯》第一次登出这张照片的时候,好多人眼睛一亮,跟我说:“哟,这个小媳妇就是放到现在,也是个美人!”是的,除了裹着的小脚已经迈不进新时代的门槛之外,在洋溢着幸福的眼光里,这张全家福让我们穿越时空,看到了90年前三台岁月静好的模样。

即使没到三台,我也是醉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主张延续湘乡经世之学,而桐城望族出身的姚永朴、马其昶之流却倾向于收窄“古文”范围,以与学制“文学”一科对接。吴闿生曾借他人之口对“二姚一马”篡改“曾、张及先师推大斯文之途术”表示不满(《北江先生文集》卷七《王古愚遗集序》)。而受“西人归古文于美术”(《书黄生劄记后》)观念影响,早就声明过“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1904年)的林纾,显然更接近姚、马的立场。

在《北洋画报》印出“海内三古文家”合影的左侧,是林纾犹子林华(实馨)寄赠的一幅《畏庐老人林琴南遗像》,同期第三版还刊有《闽县林实馨己巳增例》一则。由此推断,画报登出的合影大概来自林家。两周以后,1929年9月17日出刊的第372期《北洋画报》

终于刊发了题为《编者之过也》的更正,同一版还登出林华赠刊的《畏庐老人林琴南晚年遗像》以正视听。一桩阴差阳错的合影公案就此了结。

而若将眼光放大到《北洋画报》的整个版面,看看前后几期,会发现无论“三古文家合影”还是林纾画作、郑孝胥诗卷、陈衍题字……这些光宣老辈心心念念的物件,实是处在“美国影星克拉宝(Clara Bow)女士之河水浴”、“白兰美(Madge Bellamy)之沙舞”乃至“玉人三绝眼眉腰”之类香艳图片的包围中。这固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鲁迅所说“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的现代景观,也可以说是从林纾这代文家开始,将古文定位为一种“美术”乃至“余闲”的势所必至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